



神在人间的光芒 科技变革的时代

云 外

《行在宽处》

马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马云,商界思想家,带领万通前进 23 年,守正出奇,践行理想,筑梦踏实。在挣钱时,如何才能达到离钱近,离事远,离是非更远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有效地与他人沟通、结交朋友、提高个人实力?民营企业如何才能走出“原罪”?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如何才能做到“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 制度建设与效率优先在公司治理层面如何考量?在多元化发展与专业化道路上,管理者应当如何选择?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作为一位具有责任感、情怀与远见的企业家,马云集数十年思想沉淀,以诙谐、麻辣的文字对此给予了解读。

《文豪之家》

[日]高桥敏夫/田村景子 主编
王雯婷/孙堂双/王景 译

新星出版社

夏目漱石、江戸川乱步、谷崎润一郎、松本清张……从明治、大正到昭和,他们是日本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本书带您走进 36 位日本文坛巨匠的私生活场所,去一探他们写作的舞台,卓越的文字之源。精美的图片,翔实的资料,编者展示了文豪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态度。为了解一位作家,阅读一部作品,增添了更具趣味的视角。主编高桥敏夫,文艺评论家、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田村景子,早稻田大学、亚细亚大学讲师。

《时代的变换》

徐昊/马斌 著
华章图书

这是一部有深度和前瞻性的著作,它从科技、媒介、人文三个既相互关联又渐进影响的层面厘清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能帮助我们总结过去,回顾互联网世界已经发生的,驾驭现在,看清移动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的,决胜未来,预知信息世界尚未发生的,治愈这个时代的“互联网焦虑症”。科技延伸媒介,媒介更新人文,人文重塑商业规则。这是信息时代进化的必然,更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沿着这一脉络,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大机遇、科技在换代、科技延伸媒介、媒介更新人文、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平衡。

《神在人间的光芒》

陈喜辉 著
中信出版社

“那里夜夜都有月光”,希腊神话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令人神往的世界。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同时对西方的文化与生活影响深远。陈喜辉的希腊神话欣赏课在哈工大开设近 20 年,每年选课学生近 2000 人。从诸神的宏观政治、微观情史到英雄的沉沦命运、绝境悲欣,他驾轻就熟,旁征博引,巧妙打通,生动叙述。本书以课程讲义为基础,在绝对尊重原典的前提下,把纷繁的神话重新编排,划分神圣山王族、在野神灵、大地超人、伤爱情四大板块,解决了由来已久的人神混讲、故事交叉的难题,而献给诸神的生动绰号则让古老的神灵跃然纸上。阐释极富当代性、现实性和趣味性,在毫无关阔感的叙述分析中,解析故事深处蕴含的人性秘密与文化意义。

“格非出了本书,居然拿《金瓶梅》和《红楼梦》比。”有人对此不解甚至不屑。面对争议,格非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金瓶梅》中的人情世故远未结束”

有其特殊的现实条件,我不能到处说《金瓶梅》有多么好,别人会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所以我们周围爱看《金瓶梅》的人聚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能言说的心领神会的感觉。”

这种感觉当然不能替代他对于《红楼梦》的评价。《金瓶梅》中有很多东西《红楼梦》没有继承。所以在格非看来,《红楼梦》更多的是一种描写青春期的诗意作品,《金瓶梅》则是扎根于现实土壤,更辛辣、更自然,也更虚无。“后世很多研究者都说《金瓶梅》为《红楼梦》提供了蓝本,于是忽略了《金瓶梅》在文本上的开创性和复杂性。”格非说,他写这本书,就是想揭开这种被遮盖的文本价值。

很多时候,不是不够聪明,也并非没有洞察力,而是欲望所困,成为透视真相的雾障。格非每次阅读《金瓶梅》都非常伤感。因为他发现 400 年前的人情和世情,到了今天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从清代开始,就经历了太多的思想政治变革,但是基本的人情内核依然相似度很高,而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情世故上可能比《金瓶梅》的时代更糟糕。“你不得不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中去思考,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年来,社会的内核依然没变?对法律的悲观、对人情的冷漠、对功利的追求,而且追求功利时对任何东西不管不顾的决绝,《金瓶梅》的笔触实在是太冷了。”格非在阅读中,不止一次会产生一种恍惚感,他觉得这似乎不是历史小说,而是一本跟当今社会现实有复杂关系的书,《金瓶梅》中的生活远远还没有结束。

先锋小说退场之后

在上世纪 80 年代,格非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唛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的标志性作家。他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地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和余华、苏童等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马托邦三部曲”画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的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

这种自省无疑是有缘由的。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我发现西方很多学者谈到中国小说和文化都非常谨慎。比如热奈特,他会特别强调说,我的理论不包括中国小说。他们看待中国小说非常尊重,作为另案处理。相反,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我们的文化有特性,认为中国小说是垃圾,要扫除。”

在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锺清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得到滋养。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此后也有读者认为,作为三部曲,《春尽江南》与前面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有断裂,格非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有在写一部作品。即便是十年之前作的《敌人》,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

我们的时代怎么了

写《欲望的旗帜》的格非,还在试图表达某种理想化的东西。这大概是同时代作家共同的特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作家开始重新思考。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的性格,应该再含蓄一些;

中国的工人们

一两万元就买断了工龄。买断之后,你以后如果不能交上社保,你就没有退休金。这对许多家庭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好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基本上都有退休金了。后一代工人,分两种,一种是在国企。那基本上是父辈辈,甚至爷爷辈是工人,他接班当工人。另一种,更多的是农民工。现在的工人,大部分在一线工作的,已经不是工人的后代,而是农民的后代。农民工进城,变成了企业的工人,或者是大学毕业后进工作的工人,工人的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无非是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生产安全保障;第二点是工资收入提高,第三点是退休金待遇和医保待遇。

总体而言,国家应该感谢工人阶级。工人

那,你才会惊呼原来雪地里还藏着这么一只鸟。”雪地里的鹭鸶趴了很久?也许自明朝万历年间就在了,已经固化为因年代久远而模糊的雕塑,而在格非带有体温的阅读与书写中,鹭鸶复活了,它飞起的刹那,也许有疑惑,也许有惊诧,也许有更多的“以为”是神话。

这一切也许都在格非的预料之中。他说,“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代表一种意象,包含很多民间智慧。《金瓶梅》写人情世故,平时大家笑脸相迎,人情中尽是那些“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之间那种背叛、欺骗和倾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见的,但当你看见时一切都太迟了,书名“雪隐鹭鸶”就象征着人情的险恶。

这是我们多数人在阅读《金瓶梅》时没有的体会。格非能如此深入地体悟《金瓶梅》作者的洞察力,足以证明,除却他本人有非常的洞察力之外,更多的是他的思想抵达了作品的奥妙与本质。

《金瓶梅》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关照

格非说,《金瓶梅》的阅读令他既佩服又惊奇。“《金瓶梅》在叙事技法上太精彩了,很多东西《红楼梦》都不具备。在那个年代,道德

宋 庄

《红楼梦》的影响何其大,而《金瓶梅》在多数人的阅读印象中只是关乎情色。

而格非在新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没有出版之前就表现出他一贯的自信,两年前他对格非长篇小说《春尽江南》采访时,他就透露,这本关于《金瓶梅》的著作“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序言中格非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金瓶梅》的看法缘自 20 多年前与作家和评论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的一场争论。批评家朱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使“红迷”格非深受刺激。

可是他不会偏执地维护已有的论断或观点。在仔细读完《金瓶梅》之后,他对朱伟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

这种“亲切感”在多年来的阅读与体味中像藤蔓般密密匝匝铺延开来,变成不得不说的故事。没错,是故事。他那么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解析《金瓶梅》自然别有一番情趣。

“白色的鹭鸶站在雪地里,不认真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而只有等到它起飞的一刹

梁晓声

我是工人的儿子,我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远离家庭出去工作。先是在省内参与建设,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奔赴“大三线”了。我 7 岁之后,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之前,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半年。因为他每隔两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一次探亲假只不过 12 天,住到 12 天他就走。我下乡之后,我就见不到他了。他探亲的时候,我不一定探亲。我探亲的时候,他又不一定探亲。所以父亲越来越变成一个影子。

他 62 岁才退休,单位照顾,说梁师傅你晚退两年吧,你家困难啊。他退休之后的工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退休工资,不过才 46 元多。他拿到过的最高的工资是 62 元。他的一生都交给了我们国家的建设,除了“大三线”,还包括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他都参与建设了。他也作为群英会的代表上过天安门。在困难的时期,

改变孩子还是改变自己 都要从阅读开始

本报实习生 花梦然 张晶晶

“当今时代,很多成年人不读书,他们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娱乐、社交、应酬中度过。受父母影响,孩子们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很多孩子不喜欢读书,他们的课外时间大多由电子产品相伴。一部分孩子喜欢在网上、手机上阅读,读的大部分是网络小说、玄幻小说等。读这类小说的孩子往往不能健康成长,他们在虚拟世界中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穿越时空,久而久之,严重脱离现实,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贾容韬感叹道。他是家庭教育专家、网瘾戒除专家、2012 年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2013 年出版的《改变自己》一书在没有任何营销宣传的情况下,靠口碑传播,一年内销售 15 万册,成为家庭教育图书中的一匹黑马。

在书中,贾容韬将阅读作为家庭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多年来,在我接触的上万个家庭中,凡是阅读好书的儿童,大多有思想、有定力,抗拒诱惑的能力比较强,在浮躁、喧嚣的社会中,不容易迷失方向。”在他看来,阅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惜,很多时候并没有被很好地挖掘。

贾容韬举例,河南洛阳的程欢欢,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中下等,语数外三科均在五六十分徘徊。贾容韬说:“我和欢欢接触后,发现她阅读贫乏,基本没有课外阅读意识。通过两小时交流,我把她的读书欲望激发起来,并送给她 3 本书——《爱的教育》《小王子》《草房子》。从不太习惯到比较自觉,欢欢一个多月读

我们没有水泥,他发明怎么样用三种混合的泥土,替代水泥。当然我认为这肯定是代替不了的,那个房子肯定挺危险的。但是当时没有水泥,没有办法。在他去世前,弥留之际,他想着告诉我,他的存折放在哪儿。我说我知道。我打开那存折,上面只有 6000 多元。我曾把他接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经常给他一些钱,至少也给了他 3000 元,但是他退休将近 10 年了,70 多岁去世,他的存折上也就只有这些钱。

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人生。我家没有住过所谓的公房,因为公房不可能分到父亲名下。后来的工人,就变成了我这一代人,返城之后,顶替自己爸爸妈妈的工作,叫接班。他们上世纪 90 年代被买断工龄。当年,做工人做了那么长时间,

孙伟科

假如我们把小说看作是语言的迷宫,叙事学就是寻找走出语言迷宫的指针。《红楼梦》的研究虽然已经汗牛充栋、繁富无比,但作品的深刻思想、作者的主观意图是通过何种叙事方法得以实现的则依然是未能穷尽的话题,这就涉及到了特殊的小说修辞,而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就是对这一特殊修辞的研究。

叙事学的理论引入在我国已经不算太晚,但却成果寥寥。原因在于人们依然不能将叙事学转变成为研究小说的观念和方法,“让其发挥观念变革的威力,大多数命名为‘叙事学’的研究,实质是将叙事学研究统摄在传统小说观念之下,假借其名而行之而已,对《红楼梦》,以及经典小说的研究依然没有走出旧有的格局,这样虽然叙事学貌似引进了、尝试了,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王彬先生的《红楼梦叙事》则不然。我认为这本著作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在叙事学方法的运用上、观念的变革上、文本肌理的缜密上,具有叙事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换言之也就是真正具有回归文本的召唤意义,而这样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从而为我国文学研究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红楼梦叙事》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

是的,《红楼梦》是一座语言迷宫。比如叙述者,为什么出现了“抄录者、整理者、评阅者”等的不同?再比如时间,为什么有时候作者将时间那样模糊处理而有的时候又那么明确地肯定?一会儿是不知过了“几月几时”,一会是“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再比如评价,小说对人物的评价性语言,为什么会常常让我们感觉错位?贾效果真是“治家有方”吗?王夫人果真是“宽厚仁慈”吗?袭人果真是“贤袭人”吗?贾宝玉果真是“腹中草莽”

吗?特殊的修辞方法、时间和叙述的叠加,构成了文本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其中对“伪时间”、“不可靠叙述”修辞技法的定位揭开了谜底。深刻的作品往往有复杂的构成,它是“曲折复义”的文本,而不是“单义直接”的文本。

王彬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的同时,又将中国的叙事方法与其相结合,创造性地总结出“动力元”、“漫溢话语”、“时间零度”与“伪时间”等新概念与新方法,从而为《红楼梦》的研究寻找到了新指针。王彬认为,方法创新实质是观念创新,新方法的密集出现自然意味着“范式革命”的意义。但是,有些人并不理解“新概念”、“新范畴”实际上是对新事实——隐藏在背后的事实的揭示,所以它所展示的文本新现象隐含着对文本认识的变革,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化的。

虽然《红楼梦》文本具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性”和“技巧性”,虽然文本的语言构成一唱三叹、曲折回环、首尾瞻顾、前呼后应,但是作者的思想并不模糊或犹疑。文本的构成肌理延续着一种审美经验,是作者达到审美表达的手段,而含苞待放、得鱼忘筌,作者的意图唤起我们的共鸣则毫无疑问。假如《红楼梦》文本是作者思想的直接呈露,那么我们还会反复揣摩、玩味和品鉴吗?再换一个角度,假如作者的赞美、同情、哀叹、声援,总是与我们的价值观、人生理想相悖逆相矛盾,那么阅读、享受《红楼梦》还能让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吗?

深入梳理与认真分析《红楼梦》,将其提高到与时代相适应的水平,啃这个硬骨头则

可是他洞穿了繁华底下的千疮百孔。“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一个社会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近期的《博尔赫斯的面孔》、《雪隐鹭鸶》等作品,也隐含着他一贯的写作追求: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看,更希望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他的许多小说都有着博尔赫斯的影子,如《马玉兰的生日礼物》、《未来》、《时间炼金术》,等等。而《博尔赫斯的面孔》作为他早年的学术论文的题目再次被移植,可见他的喜爱。而对于博尔赫斯的认识与理解因岁月的沉淀和思考的积累变得更为丰富。这类随笔或可视作格非沉重的写作之余相对轻松的调整。

他对同时代的作家,认识非常清醒:心灵比较敏感,但是经验相对贫乏。如果一年写两本,经验无法去支撑写作。“我的习惯是这样,大脑齿轮在转,转到热了,比较好用的时候写作。写完需要休息,再转快的时候,再来写。”格非说,一定是 90%的理由说服自己可以写,才去写,他从来不会贸然动笔。在《春尽江南》中,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人心。他觉得,好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对国家、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



资已经提高两次了。尽管幅度都不大,但毕竟说明,这些存在的问题,国家看在眼里了。

我对工人阶级感情很深。怎么会不深呢?我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工人。在电视剧《年轮》《返城时代》中,都满怀深情地刻画了父辈一代的工人形象。以后我还会继续创作表现工人阶级的作品。作为政协委员,我也会继续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福利大声疾呼。

分析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状况和社会生态。他关注政治、经济、民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笔端常常感情,直面社会现实,反思文化传统,剖析国民性格,倡导公平正义,高扬人文主义旗帜,言语振聋发聩,思想直指人心。是作家告别理想主义之后高高举起的一面人文主义旗帜。

上文摘自梁晓声先生在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社会》新书发布会上上的演讲。

用叙事学作《红楼梦》研究的指针